

· 中国文化史知识 ·

## “苍颉四目”试解

钟 年

文字是人类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sup>①</sup>文明有许多标志，除文字外，有的学者看重金属工具的出现，有的强调大规模建筑及城市，但“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欧洲的远古文化只有爱琴—米诺文化，因为它已有了文字，可以称为‘文明’。此外，欧洲各地的各种史前文化，虽然有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甚至进入铁器时代，但都不称为‘文明’”<sup>②</sup>。文字如此重要，折射着上古社会发展真实情形的古神话中自然便有了文字起源的叙述。

我国最著名的文字起源神话是苍颉造字，然“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sup>③</sup>，这已非最原始的文字，据《说文·序》曰：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这种说法是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八卦的起源甚早，赵国华先生经

考证认为，八卦的起源与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彩陶鱼纹有关<sup>④</sup>。此外，在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有一百多个共约三十二种刻划符号，这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邠阳莘村、铜川李家沟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仰韶文化遗址中亦曾多次发现。<sup>⑤</sup>刻划符号是后世成熟文字的先驱，它们或许也与八卦有渊源联系。可看作与八卦同期的记事体系。至于结绳，乃常见的原始记事方法，《庄子·胠箧》有“民结绳而用之”的说法，《周易集解》引虞郑《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誓约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在世界各地不乏结绳的实例，如在秘鲁印加人中，“‘结绳文字’的主要部分是一根粗绳，它上面系着一些带有大结小结的细绳。细绳和结的数目、大小、相互排列位置和颜色都含有一定意义”<sup>⑥</sup>。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傈僳、独龙、高山、怒）中直至本世纪初仍使用结绳的记事方法。<sup>⑦</sup>

令人感兴趣的是文字创造者的真实身份。苍颉造字的故事已流传数千年，但苍颉的本来面目却似乎还少有人关心。一般认为，苍颉是黄帝史，如前引《说文·序》：“黄帝之史仓颉。”又如《论衡·首相》：“仓颉四目，为黄帝史。”或说苍颉为古帝王，如《水经注·洛水》引《河图玉版》：“苍颉为帝。”《尚书·序》疏：“仓颉，古之王者。”但帝、王、史的身份应该是苍颉造字后获得的，其本来身份史籍却未明言。好在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诸书记载中对苍额外貌描述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他有不同凡俗的“四目”，如《太平御览》卷七四九引《书断》曰：

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

此乃探明苍颉身份的主要线索之一，或可着落于此，揭开苍颉的身世之谜。

“苍颉四目”自然是神化，在我国神话人物中，有四目者并不多见，我们马上可以联想到“黄金四目”的方相。《周礼·夏官·方相

氏》曰：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燄方良。

由此可知方相是傩仪的主持人和执行者。“傩是源远流长的祭祀性巫术活动，其目的在于驱鬼逐疫、祈福禳灾，就其结构与功能而言，傩是禳除巫术的一种。”<sup>⑧</sup>因而方相是巫师无疑。另外，我国珞巴族有个神话叫做《阿巴达尼失掉后眼》，说的是阿巴达尼原有四只眼睛，前后各二，后眼是对付妖魔的；后来妖魔用计让他摔掉了后眼，从此妖魔不再怕他；他没有别的法子，就宰杀禽畜，请“麦巴”（巫师）念咒，这样就有了巫术和祭祀。<sup>⑨</sup>这个神话中也提到了“四目”，而拥有四目的阿巴达尼能对付妖魔，实可称为珞巴族巫师的祖师爷。由此观之，与方相、阿巴达尼同样有四目的苍颉其本来面目大概也是个巫师。这又有上引《书断》中苍颉“通于神明”一句为证，《说文》释“觋”曰：“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徐锴注：“能见神也。”在原始社会，“巫师常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神秘力量或有能力与超自然领域沟通”<sup>⑩</sup>。苍颉首生四目，又可通神明，不是巫师又是什么？<sup>⑪</sup>

苍颉既为巫，那么文字就是由巫发明的了，这正与人类学的研究结论一致。“从民族学资料分析，人类最早的记事方法是结绳、刻木和物号记事，这些记事工具最初并不是记录财产，也不是记录自己行走的里程，而是巫师们在自己的祭祀、巫术活动中应用的一种记号。”<sup>⑫</sup>文字就是从这些记事工具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宋兆麟先生例举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巫师与文字的关系对此作了说明：“彝族的毕摩发明了彝文；纳西族的东巴发明了东巴文；耳苏人的巫师发明了耳苏文，等等。这些文字最初都是出于宗教祭祀活动，后来才逐渐为社会上所推广。所以，文字的发明跟巫师有极密切的关系。”<sup>⑬</sup>

在神话传说中，苍颉为黄帝史，而另一位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史皇<sup>⑩</sup>则从名字上也可看出与史的联系，由此又可窥见创始文字的巫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说过：“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sup>⑪</sup>。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巫史混融期。学术界认为，随着阶级分野的明朗化、统治秩序的制度化，以及文字的创制和普遍使用，巫的职责也由单一的占卜扩大为参与政治管理；巫参与国家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掌官书以赞治”（《周礼·天官》），他们在甲骨文中被称为“作册”、“史”、“尹”。<sup>⑫</sup>而古神话所折射的史影，则表明中国的史官是由巫转变的。巫的职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占卜，正如张紫晨先生所说：“初期的史官多为巫一类的人物，系历史上所称的‘卜’、‘占’、‘祝’、‘巫’等身分的人担任。……中国的巫，当其跨入夏商周三代以后，便以史官的身分出现。”<sup>⑬</sup>民族志的资料表明，远在文字出现前历史还在口传时，巫就是氏族部落的“史官”。“巫师是最早通晓历史的人，并且精心收集、保存和传播历史知识，他们是宗教的主持人，又是最早的史学家，巫史结合，正是史前时代历史学的特点。”<sup>⑭</sup>

对于史由巫出，萧兵先生综合诸说，从“史”<sup>⑮</sup>字的考释入手，做了详尽的阐述：“‘史’的原义是从手持‘中’。‘中’的说法有好几种，比较确切的是盛放简策的圆筒子（《楚辞·离骚》之‘筭筭’近之）。中国之‘中’，中国哲学中心的‘中庸’之‘中’，也根源于这个‘中’。‘巫史’把祝词卜问刻划在简策上，把简策置于圆中里，然后请求神意的抉择与暗示，有点儿像后世的问卜求签。这最初当然要由巫祝来担任，而祈问的对象或其代表就是‘神尸’或‘祖尸’，所以‘史’跟‘祝’、跟‘尸’都有直接关系。而巫祝向神尸的卜问行为就构成‘史’之意象。‘史’在上面加一道小横杠，就是‘吏’（或‘使’），说明后世的官吏、大使等便由‘史’化出。而把篆文的𠂇或𠂇稍加延扩，便成为事（事），人事、神事、鬼事、国事、天下事……本来都只是祝宗巫觋之‘事’，都离不开民俗宗教文化，尤其是在中国、中

原！”<sup>②</sup>如此，创制文字的苍颉们先为巫，后为史，对中华文明的萌生及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页。

②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③《蔡邕集·篆势》。

④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2、3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⑤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⑥〔苏〕B.A.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⑦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90—391页。

⑧李子和：《信仰·生命·艺术的交响——中国傩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

⑨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通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5—506页。

⑩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6页。

⑪据说炼气功至一定境界，可在二目之间炼出一只内眼，即所谓天眼通；而神话传说中许多英雄神人也生有三眼，第三眼中常可射出神光神火之类，如我国之二郎神。推想起来，在先民信仰中，多余的眼便是天眼神眼，故可通神明。

⑫⑬⑯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10、317、334—335页。

⑭《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说郛》卷四二引《山水纯全集》则曰：“史皇状鱼龙之迹，仓颉因而为字，盖画先而书次之。”后世史皇与仓颉逐渐合为一人。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25页。

⑯参见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3页。

⑰张紫晨：《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7—8页。

⑯《说文》释“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

⑰萧兵：《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

## 我所见到的“晋府图书”

家藏小字帖一本，呈蝴蝶装，帖长30.5公分，宽14.5公分，封面封底为绫装，呈深蓝色有方形及圆形金色花纹图案。帖的内容为：宣示表、羲之临钟繇帖“墓田丙舍”、繇白昨疏还示、史孝山“出师颂”（章草）、隋僧智永集王右军书。

帖的第一页右上角盖有阳文篆书“晋府图书”印章一枚。每一帖后都盖有“旧月廩印”，此印乃家藏书之印。曾祖父名姚士璋，字械卿，又名熲。为清光绪十五年二甲进士，翰林，工小篆，善篆刻，刀法布局类丁钝丁，著有《说文通俗解字》（现存半部）。受当时海州知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廖能之聘，到海州石室书院及敦善书院讲学，后在海州去世。想他对书法当另具慧眼，此帖即他遗留之一种。

从字体上看，此帖既收有钟的八分书，又收有史孝山的出师颂章草，以及智永集王字，羲之临钟字。此帖呈以钟字为主，但对于钟的‘戎路表’、‘荐关内侯季直表’、‘力命表’都未收入。且此帖在未表之前，其原刻石曾有人多次捶拓，故现在仍留有痕迹。

在出师颂的标题下方，有圆形蝌蚪文章一，方形“宣和”二字章一枚；结尾处有“政和”章、“咷咷”章各半枚，有“文艺敷泽”及“又印”一枚。以上各印均在原碑帖刻有。

字帖的空白页是黄色洒金纸装裱。封底封面均为厚纸版裱成，其他各处无名人题记款识。但从字帖的装裱情况看，又非是寻常百姓所有。

• 姚菊生 姚政 •